

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战略三角观理论视角的组态分析

郭敏敏，衣长军，李楚薇

(华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数字平台企业通过颠覆与重构传统价值创造模式，显著改变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逻辑。基于战略三角观理论框架，本文以 2023 年福布斯全球百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系统识别了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组态路径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企业的区位选择呈现出“资源主导型”与“制度适配型”两种路径类型，而非数字平台企业则表现为“行业—制度协同型”与“行业—资源协同型”两类组态路径类型。本文研究从组态视角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差异化投资路径作出了系统性解释，拓展了传统国际商务理论在数字平台这一新兴组织形态中的应用边界，为跨国企业在全局范围内优化投资布局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数字平台企业；区位选择；战略三角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034(2026)01-0097-19

引言

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区位选择决策，直接关乎其跨国运营成本、海外投资效率及长期绩效表现(Jain 等, 2016)。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百度、Paypal、阿里巴巴、TikTok 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企业基于网络效应和数字技术等优势，快速成为当前全球对外投资的新兴主体力量。数字平台企业是指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根本属性，利用数字化的

[收稿日期]2025-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实技术深度融合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韧性及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机制研究”(25BGL028)

[作者简介]郭敏敏(1996—)，女，河北张家口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融资与国际企业管理；衣长军(1972—)，男，辽宁丹东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投融资与国际企业管理；(通讯作者)李楚薇(1997—)，女，福建莆田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融资与国际企业管理

接口传输标准化、模块化的资源,促进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满足多方交互需求,并通过维持和引导各参与者之间的产品、服务或信息等要素的交换来创造价值的新型平台组织形式(Brouthers等,2016)。传统非数字平台企业一般依赖于价值链活动,通过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进行利润获取和价值创造。而数字平台企业将价值创造过程转移到企业的正式边界之外,主要由经济需求侧的外部用户来驱动价值创造(Chen等,2019)。独特的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极大地改变了数字平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方式与路径。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可能会呈现出与传统企业不同的路径,其对传统国际化进程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徐美娜和夏温平,2021)。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平台企业应如何把握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机遇,破解新困局,进而做出科学的区位决策,已成为当前国际商务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国际商务领域,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独特性,且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研究。数字平台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独特的网络效应机制。网络效应具有用户规模依赖性、交互增值性和边际收益递增性等典型特征,导致数字平台市场往往呈现“赢家通吃”的竞争格局(Cennamo和Santalo,2013)。因此,与传统企业更注重土地、自然资源等有形资源要素不同,数字平台企业更加注重目标市场的潜在用户规模和数据等无形资源基础条件,以便利用网络效应实现需求方规模经济和生态锁定效应(张新民等,2025)。二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徐美娜和夏温平(2021)研究发现当地数字平台企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同类企业的进入。三是基于宏观制度视角的研究。Surana等(2024)指出,传统企业高度依赖宏观制度基础(如双边制度距离),而数字平台企业则能凭借其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等数据资源优势,主动获取并适应东道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从而有效克服由制度差异带来的合法性挑战。以上三方面的主要差异,使数字平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路径呈现出独特性。虽然目前学者已基于行业密集度(徐美娜和夏温平,2021)、企业人力资本(李潇和韩剑,2023)、国家(或地区)间制度距离(杨连星等,2024)等视角阐释数字平台企业的OFDI区位选择,但缺乏综合性分析框架以识别多元化路径。综合来看,企业内外部资源、国家间制度和 cultural 差异、行业环境等条件是影响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三者间的复杂协同关系不容忽视。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缺口,本文基于战略三角观理论视角(Peng等,2008),系统整合了产业组织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以2023年福布斯全球百强企业(涵盖数字平台与非数字平台两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从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三个方面揭示了两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组态路径及其异质性特征。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本文基于战略三角观理论,探讨了多因素对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将传统国际商务

理论扩展到特定的数字平台企业这一新型组织形态,强调并解释了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异质性特征。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企业在应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方面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平台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其次,不同于传统的回归分析或单一权变视角研究,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了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 OFDI 区位选择复杂路径。本文不仅响应了学者对国际商务领域 fsQCA 方法应用的研究呼吁(赵云辉等,2020),也从组态视角更好地解释了不同条件组合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通过应用 fsQCA 方法,本文研究不仅揭示了制度环境、网络效应和企业规模基础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指出了在不同情境下数字平台企业如何通过不同路径实现海外投资扩张。最后,本文聚焦了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进一步对二者 OFDI 区位选择的差异化组态路径展开分析,为揭示数字经济背景下不同企业 OFDI 区位选择驱动因素与组态路径的异质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果复杂性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前因研究大多是基于单个因素的净效用。在资源影响因素方面,Cader 等(2013)以美国中部地区信息技术企业为例,发现企业规模对其 OFDI 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此外,企业所有权性质与战略导向同样是影响其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Wang 等,2020)。在行业竞争方面,徐美娜和夏温平(2021)认为同行业的企业集聚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数字平台企业进入。在制度方面,蒋殿春和彭大地(2023)以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强化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企业向制度距离远的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可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涵盖了资源、行业环境、制度差异等因素,具有因果复杂性。

现有研究基于传统权变视角,通过单独分析某一因素的净效应来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动因,但未能充分考虑跨国企业在海外选址决策中所涉及的因果复杂性。因果复杂性将管理学研究的焦点从单一的净效应转向因果复杂性的探讨,能够细致地解决管理学问题。OFDI 区位选择是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项关键决策,需考虑行业环境、资源条件和宏观制度等多重复杂因素。赵云辉等(2020)通过分析 177 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例,发现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经济禀赋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化组态形式。余珮和陈漪澜(2024)则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揭示了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的多重交织,共同塑造了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天然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多样化组态模式。此类研究均从因果复杂性角度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区位选择问题。由此可见,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时,面临的是一个由多维度、多层次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

(二) 战略三角观理论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对跨国企业的海外运营效率、投资效益与长期绩效具有深远影响。学界主要基于产业组织理论、资源基础观与制度理论等视角,探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因(张纪凤,2015)。其中,以Porter(1981)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强调产业环境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关键影响,其重点关注产业结构特征与市场竞争格局,如产业吸引力、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发展水平对企业竞争优势与战略决策的作用(杜国臣和吕振艳,2013;蓝海林等,2018)。资源基础观指出,即便处于相似产业环境,企业所能调动与整合的异质性资源仍是其构建竞争优势与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依托(Barney,1991)。然而,上述两种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差异所带来的“合法性缺失”对海外投资战略的制约。为此,Peng(2002)提出制度理论,强调制度不仅是企业竞争的前提,更能直接影响其战略选择。

尽管上述理论各自贡献了重要洞见,却未能系统揭示产业、资源与制度三类因素间如何交互作用,并协同影响企业战略决策。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口,Peng等(2009)创新性地提出战略三角框架,系统整合了产业组织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构建出更为系统全面的分析范式。战略三角观兼顾了企业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不仅弥补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也为理解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战略机制提供了更完整、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解释与支持(何晓明等,2025)。基于此,本文运用战略三角观,系统剖析了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组态路径,以期对企业海外选址决策提供更深入、更具整合性的理论解释。下文将具体阐述影响跨国企业投资区位的产业、资源与制度三类因素的选取依据与其内在作用机制。

1. 产业组织理论视角: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数字流通限制

产业组织理论将“产业”定义为生产相似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以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核心范式强调,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并最终影响市场绩效。在这一视角下,数字平台企业凭借其多边市场架构与数据驱动优势,深刻重塑了传统产业边界与竞争规则,形成了高差异化的独特市场结构。因此,是否属于数字平台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结构特征变量,其直接影响了该类企业群体的战略行为与区位选择路径。

进一步地,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战略需基于对目标市场产业结构与进入壁垒的深入分析。数字平台高度依赖数据与网络效应(马鸿佳等,2024),因此,目标市场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成为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考量。高水平的基础设施能激发出强大的网络外部性(李晓静等,2023),从而重塑产业的成本结构、规模经济边界与技术溢出方式。产业政策则是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下影响市场进入壁垒与企业行为的核心外生变量。数字流通限制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通过规制数据的跨境流动、交易方式与使用范围,直接影响了数据的合规成本与可获得性(王晶晶和余雅楠,2025),进而构筑了新型的政策性与合规性进入壁

垒,显著改变了行业的集中度与竞争格局。因此,数字流通限制是数字平台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时,必须优先评估的产业政策环境因素。

2. 资源基础观视角:企业规模、企业海外背景和市场规模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源于其拥有或控制的稀缺、有价值、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基于此,本文从资源基础观出发,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海外背景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三个变量,分别表征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依赖的基础性内部资源、稀缺性组织资本与关键性外部资源。

企业规模是衡量企业所掌控的财务、物力和人力等基础性资源存量的关键指标。规模更大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资源调动能力与资金流动性,能够支撑海外市场开拓所需的巨额沉没成本(文余源和杨钰倩,2021)。企业的海外背景则代表了一种难以复制的组织经验与跨国关系网络,属于典型的无形稀缺资源。拥有海外背景的组织,能够深化对全球商业环境、文化差异与制度规则的深刻理解(衣长军和颜诗琪,2025),并快速嵌入当地商业网络,获取优质合作机会与资源支持。对于数字平台企业而言,网络效应构成其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当用户规模达到一定阈值时,网络效应可进一步转化为显著的规模效应,持续巩固平台的市场地位。目标市场的规模体现着潜在用户基数,直接决定了平台潜在用户总量与需求上限,构成平台启动并持续强化网络效应的资源基础,是平台企业可获取与运用的关键外部资源。

综上,为了系统识别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的 OFDI 区位选择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海外背景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作为核心衡量指标,三者共同构成支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资源体系。具体而言,企业规模作为基础性内部资源,决定了企业开发与利用其他资源的能力。规模更大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充足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可用于引入全球化人才、补贴目标市场用户以快速扩大平台基数、激发网络效应,并建立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杨栋旭和张先锋,2018)。企业海外背景则作为一种稀缺的组织社会资本,成为连接企业内部资源与东道国市场环境的桥梁,深刻影响网络效应在目标市场的实现程度(郭敏敏等,2025)。

3. 制度理论视角: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共同语言

地理距离是塑造东道国与母国间政治、经济与外交关系的天然基础。地理上邻近的国家往往在文化认知与制度理解上更为接近,或更倾向于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从而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如史瑞祯和桑百川(2022)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地区)作为投资目的地,表现出了“邻国效应”。地理邻近不仅有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如欧盟、东盟),也有利于加强政府间关系、降低企业跨境经营的适应成本,为海外业务拓展提供合法性。

制度距离是影响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吴小节等(2023)指出,由于商业规则、交易习惯与政策流程存在差异,外来企业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

以获取并理解当地市场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与成本，从而抑制了其投资意愿。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习俗、语言)的差异同样产生重要影响。袁柳和李勤昌(2022)进一步证实，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制度距离，均为企业 OFDI 区位决策中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变量。

需要强调的是，地理距离虽然不等同于制度距离，但会放大或缓解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约效应。一方面，地理距离增加了正式制度差异所带来的合规与沟通成本，削弱了企业与东道国政府间的互动效率；另一方面，它降低了企业对当地非正式制度的适应能力(赵家章等，2024)。

综上所述，产业环境、资源禀赋与制度差异三类要素不仅单独作用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更在互动中形成动态协同效应，共同构成影响企业区位战略的前因组态。资源基础决定了企业识别、获取与配置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为企业克服制度差异、融入产业环境提供了关键支撑。何晓明等(2025)基于战略三角观的组态分析发现，在中医药行业中，企业的营销能力作为关键资源，能够有效破解因中医药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制度性障碍。同时，产业发展格局引导着技术、知识与信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方向，并推动东道国相关制度规则的演进与完善(王寅等，2024)。而制度环境，尤其是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直接关系到企业资源的跨国转移成本与配置效率，成为重塑其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变量(马述忠等，2023)。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以战略三角观为理论框架，将产业环境—资源禀赋—制度差异三者间的协同互动作为核心分析维度，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系统构建了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条件组态，以弥补传统单一视角的不足。研究的具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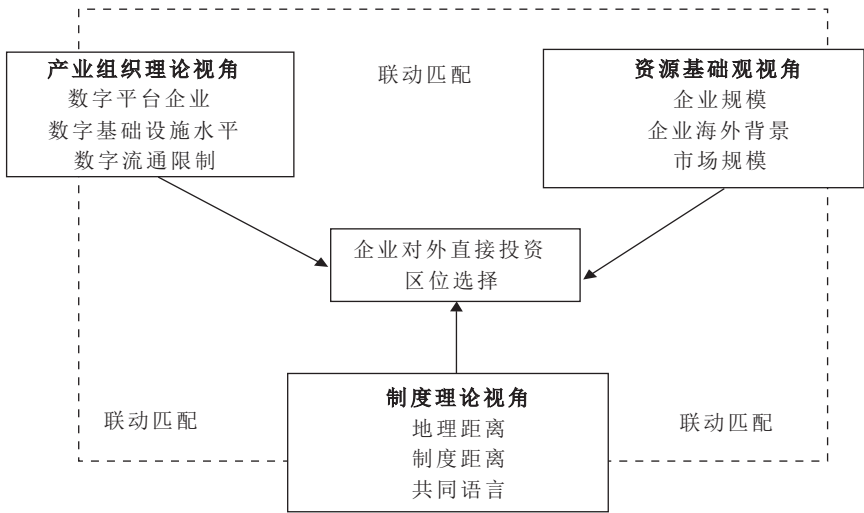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模型框架

二、研究方法

Fainshmidt 等(2020)认为,国际商务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剖析各种因素的叠加与相互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本文从整体多维视角采用组态分析,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解析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组态路径。

(一)数据收集

为了更好地展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选取 2023 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榜单^①的前 100 名全球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BVD-ORBIS 数据库获取这前百强企业 2023 年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并与世界银行数据库、CEPII 数据库等进行匹配^②,共计 4 878 条样本。

(二)测量与校准

校准是指为案例集合分配隶属值的过程。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将连续变量的数据转化为反映对某个集合隶属度的分数,使得每个案例不再是简单地属于或不属于某个集合,而是根据其特征的强度或程度,获得一个介于 0 和 1 之间的隶属分数,以更精准地捕捉到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校准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条件和结果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行业基础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0.795	0.397	-0.119
	数字流通限制	0.270	0.200	0.150
资源基础	企业规模	20.691	19.156	18.619
	市场规模	27.743	26.574	25.138
制度基础	地理距离	10 256.820	6 809.615	2 391.053
	制度距离	1.978	0.513	0.162

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在何种组态下,企业 x 做出投资于国家^③ j 而不投资于国家 k 的决策。因此,本文将投资接收国(东道国)作为结果变量,当企业投资于该东道国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不进行校准。

①该评估体系采用加权综合评分法,按照营收(50%)、利润(30%)、资产(15%)和市值(5%)四个维度的指标权重进行量化评分。

②数据来源: BVD-ORBIS 数据库, <https://login.bvdinfo.com/R1/Orbis>(访问日期 2024-07-16);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访问日期 2024-07-16); CEPII 数据库, https://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_modele.asp(访问日期 2024-07-16)。

③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所指“国”“国家”均为“国家(地区)”之意。

产业组织理论视角。本文选取是否属于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数字流通限制来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环境。(1)是否属于数字平台企业。关于数字平台企业的判定,主要依据《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①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定义和特征描述,将其定义为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如互联网、移动网络)促成不同用户群体(如消费者、供应商、广告商)之间直接交互,并从中获取价值的商业模式。本文依据福布斯排行榜前百强企业官网的主营业务描述内容,人工判断每家企业是否属于数字平台企业,若属于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由于企业类型为二分变量,故不进行校准。(2)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本文利用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使用网络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固定宽带用户(每百人)和移动电话用户(每100人)四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衡量东道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此外,在对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等连续变量进行校准时,本文参考赵云辉等(2020)的做法,采用75%、40%和15%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阈值。(3)数字流通限制。本文选取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igita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DTRI)进行衡量(沈洁,2022)。

资源基础观视角。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海外背景、东道国市场规模来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资源基础。(1)企业规模。本文使用企业资产的对数进行分析。(2)企业海外背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企业是否拥有东道国股东来衡量企业是否具有东道国的海外背景。如果企业拥有东道国股东的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由于企业海外背景为二分变量,故不进行校准。(3)市场规模。本文使用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制度理论视角。本文选取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共同语言来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基础。(1)地理距离。地理距离可以影响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互动,进而影响企业在东道国的协调成本。例如地理距离远的国家(地区)通常关税更高,监管差异更大。基于此,本文将地理距离作为条件变量,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2)制度距离。本文基于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使用Kogut和Singh(1988)的距离测算方法,得到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3)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能够增强东道国与海外投资企业之间的信任,并促进企业间文化和经济上的合作。本文将共同语言作为条件变量,如果东道国和母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共同语言具有明确的二元性,不存在模糊集的概念,因此未进行校准。

^①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EB/OL], 2017-06-07 [2023-03-01].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17>.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本文对各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本文遵循 fsQCA 研究的标准, 对每个单独的条件(包括其反面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 确定它们是否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本文利用 fsQCA3.0 软件进行检验(如表 2 所示), 发现非数字平台企业的一致性高于 0.9。

为了进一步验证必要性条件是否存在, 本文采用 R 语言中的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所有条件变量的效应量小于 0.1, P 值不显著, 因此可以判定企业的区位选择没有可识别的必要性条件。此外, 表 4 报告了瓶颈水平分析的结果。瓶颈水平是指在实现结果观测值范围内的某一特定水平(%)时, 单个前因条件在其观测值范围内所需满足的最低水平(%)。结合表 3 和表 4 的分析结果,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不存在必要条件。

表 2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投资接收国	
	一致性	覆盖度
数字平台企业	0.027	0.333
非数字平台企业	0.973	0.432
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0.666	0.474
中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0.334	0.361
高数字流通限制	0.618	0.453
中低数字流通限制	0.382	0.396
高企业规模	0.472	0.366
中低企业规模	0.528	0.508
高企业海外背景	0.417	0.653
中低企业海外背景	0.583	0.345
高市场规模	0.724	0.547
中低市场规模	0.276	0.274

续表

条件变量	投资接收国	
	一致性	覆盖度
高地理距离	0.547	0.402
中低地理距离	0.453	0.467
高制度距离	0.493	0.384
中低制度距离	0.507	0.484
共同语言	0.202	0.603
非共同语言	0.798	0.400

表 3 NCA 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	方法	精确度 (%)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P 值
是否属于数字平台企业	CR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CE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CR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CE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数字流通限制	CR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CE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企业规模	CR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CE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企业海外背景	CR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CE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市场规模	CR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CE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地理距离	CR	100	0.000	0.990	0.000	1.000
	CE	100	0.000	0.990	0.000	1.000
制度距离	CR	100	0.000	0.990	0.000	1.000
	CE	100	0.000	0.990	0.000	1.000
共同语言	CR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CE	100	0.000	1.000	0.000	1.000

注：采用置换检验，重复采样次数为 10 000 次。

表 4 NCA 对单个条件必要性瓶颈水平 (%) 的分析

投资接收国	是否属于数字平台企业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数字流通限制	企业规模	企业海外背景	市场规模	地理距离	制度距离	共同语言
0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1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注：采用上限回归 (Ceiling Regression, CR) 方法。

(二)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中可接受的一致性水平以及计算方法与必要条件的分析有所不同。在充分性分析中，通常设定的可接受一致性阈值较低，表明一个条件组态并不需要在所有案例中都出现，只需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即可产生结果。根据研究惯例与样本特征，本文分别将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1 与 0.8(杜运周等，2022)，以确保所分析的组态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及可靠性。

表 5 结果显示，总体解和单个解(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 0.8，意味着模型在解释因果关系时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具体而言，表 5 中的 5 种组态均为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充分条件组合。

组态 1 和组态 2 为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充分条件，可划分为两种路径类型。组态 1 的数字平台企业采用“资源主导型”的路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组态 1 的一致性为 0.824，唯一覆盖度为 0.001，原始覆盖度为 0.001。采用这种路径进行扩张的数字平台企业拥有较多的内外部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向地理距离更远、制度距离更大、产业数字基础条件更为薄弱的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看，东道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数字产业运行与市场结构的基础条件。在数字基础设施较弱的东道国，网络覆盖不全、算力支持不足与数字支付体系缺失等问题，共同塑造出尚未充分开发且竞争程度较低的市场结构。这为具备资源与能力优势的数字平台企业提供了战略窗口。企业可凭借成熟的数字服务体系与先进技术，快速填补市场空白，建立先发优势与市场势力。进一步地，通过自建物流网络、本地化支付系统等举措，企业不仅弥补了当地数字产业条件的不足，更主动重塑了产业竞争格局，实现海外业务落地。(2)根据产业组织理论，数字流通限制作为重要的政府规制手段，直接塑造了数字服务市场的结构与企业的行为。此类限制通过数据隐私保护与跨境流动管制等法规的设立，提高了合规性进入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进而影响了市场集中度。面对这一规制环境，成熟的数字平台企业通过主动适应数据保护法规、强化隐私安全投入等行为，将外部约束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最终提升其在东道国市场的绩效表现。(3)在制度层面，开拓地理距离较远的海外市场需承担高昂的初始成本，包括市场调研、产品本地化及供应链建设等。

规模较大的数字平台企业更具备能力分摊此类成本、降低风险，并凭借其技术优势灵活调整业务模式，提供契合本地需求的数字产品与服务。同时，企业的海外背景在进入远距离市场时具有关键作用，能够加深对东道国制度与市场需求的理解，缩短海外适应周期，加速融入当地环境。因此，由企业规模与海外背景共同构成的资源禀赋，成为数字平台突破行业与制度壁垒、开拓数字基础设施较弱但潜力广阔的市场的核心支撑。此外，较大东道国市场规模有助于企业利用网络效应迅速获取本地用户，确立市场先发优势。因此，“资源主导型”是数字平台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路径类型。

表 5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组态分析

前因条件	资源主导型	制度适配型	均衡发展型	行业—制度协同型	行业—资源协同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是否属于数字平台企业	●	●		⊗	⊗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	•	•	●	●
数字流通限制	•			●	●
企业规模	●		●	⊗	●
企业海外背景	●	•	●		●
市场规模	•	•	●	•	●
地理距离	•	⊗	⊗	⊗	●
制度距离	•	⊗	⊗	⊗	
共同语言	●	●	●	●	●
一致性	0.824	0.886	0.836	0.842	0.826
原始覆盖度	0.001	0.003	0.025	0.024	0.017
唯一覆盖度	0.001	0.001	0.015	0.019	0.011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44				
总体解的覆盖度	0.057				

注：●或•代表条件存在，⊗或⊖代表条件不存在，●或⊗代表核心条件，•或⊖代表边缘条件。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下表同。

例如,2016年,阿里巴巴集团以10亿美元控股了东南亚电商平台Lazada,是“资源主导型”OFDI区位选择路径类型的典型案例。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及技术实力,以及此前在印度、新加坡等市场积累的国际化经验,阿里巴巴在支付系统与物流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东南亚地区展开了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布局,阿里巴巴迅速获得了覆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六国的成熟运营体系,有效降低了因地理距离(分散岛屿)与制度差异(各国电商法规不一)所带来的合法性挑战。同时,东南亚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持续发展的经济水平,使阿里巴巴得以借助网络效应迅速占领市场,实现规模效益递增。这一区位选择决策,充分体现了阿里巴巴作为数字平台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既规避了新兴市场常见的基础设施短板与跨国经营障碍,也为同类企业的OFDI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组态2展示了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另一种路径类型——“制度适配型”。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886,唯一覆盖度为0.001,原始覆盖度为0.003。采用这种路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字平台企业,资源禀赋不具备显著优势,因而更关注制度基础因素的影响,选择制度、地理距离较近,且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数字平台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能够打破时空限制(Autio等,2021)。然而,这一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数字平台企业。组态2的结果显示,地理距离在数字平台企业的OFDI区位决策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地理距离不仅带来运输成本、时区差异等传统物理阻隔,也增加了数字服务跨境监管的复杂性,形成多维障碍。与此同时,制度距离引发的认知差异会显著增加企业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的障碍,成为数字平台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共同语言有助于保障企业的跨境顺畅沟通与高效协作,减少信息传递偏差。在拓展新市场过程中,数字平台需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与消费习惯带来的网络子群之间的兼容性挑战。语言一致性能有效降低跨文化沟通障碍,促进东道国新用户与母国现有用户之间的互动,从而提升用户参与度与忠诚度,帮助企业更快实现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身份转换。由此可见,部分数字平台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更注重制度环境的适配性,呈现出“制度适配型”的典型路径特征。

以荷兰Adyen并购比利时PaaS平台为例。该案例是“制度适配型”区位选择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地理邻近与制度协同的双重优势。在地理层面,两国相距仅约200千米,技术团队可实现高效跨境协作,系统整合响应速度接近同城水平。在制度层面,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两国在金融科技监管框架与PSD2支付指令等方面高度协同,显著降低了跨境结算的合规成本。此外,较高的语言相似性也减轻了产品本地化的难度,从而提升了海外投资整体效率。这种以制度相似性为导向的投

资策略,有效缓解了数字平台国际化过程中的合法性压力,为同类企业的区位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路径。

组态4与组态5揭示了非数字平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种充分条件组合。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看,东道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作为关键的产业运营基础,不仅塑造了企业运营的技术环境与成本结构,也深刻影响了目标市场的产业结构与竞争格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实现信息高效流通、优化跨境物流并提升支付效率,从而显著降低非数字平台企业的跨国协调与运营成本,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形成更具吸引力的市场结构。同时,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使传统企业能够借助数字化工具提升供应链响应能力、优化库存管理与客户服务流程,实现整体跨国运营效率的系统性升级。由此可见,数字基础设施不仅作为外部条件影响企业区位决策,更通过重塑产业内部的运营逻辑与竞争机制,为非数字平台企业在东道国构建持续竞争优势提供支撑。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产业基础条件对企业国际化路径的系统性影响。

具体而言,非数字平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可归纳为两种典型路径。组态4为“行业—制度协同型”路径,其一致性为0.842,唯一覆盖度为0.019,原始覆盖度为0.024。该路径显示,地理与制度距离较近且拥有共同语言,是非数字平台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考量。这类企业倾向于进入地理邻近、制度环境相似、语言相通的市场,以有效控制双边制度差异带来的合法性风险。地理邻近有助于降低运输与物流成本,减少跨境运营中的时间延迟,尤其在传统非数字产业中,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效率与响应能力。共同语言则促进了传统企业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减少因语言障碍引发的运营摩擦与误解。组态5反映了非数字平台企业采取“行业—资源协同型”路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一致性为0.826,唯一覆盖度为0.011,原始覆盖度为0.017。该路径显示,非数字平台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较大的市场规模通常意味着更广阔的消费需求和更多的商业机会,有助于传统企业快速实现规模经济,提升销售潜力,并通过规模化生产与运营增强市场竞争力。在这一路径中,企业规模、海外背景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三者协同作用,共同推动非数字平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程。这些内外部资源要素不仅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了资源保障与能力基础,而且增强了其海外市场适应力,共同构成了非数字平台企业构建国际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

此外,组态3揭示了另一条优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路径,即“均衡发展型”。该路径表明,企业的跨国区位选择受到产业、资源与制度三类因素的系统性影响,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在产业层面,东道国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运营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推动了数字与非数字平台企业的协同发展。在资源层

面,企业自身的规模与海外背景为国际化拓展提供了能力支撑,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则为其带来潜在的增长空间。在制度层面,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显著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增强了其在东道国的制度适应力。三类因素的协同作用,使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均具备向地理距离更远、制度差异更大的国家(地区)进行扩张的能力。

综上所述,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呈现出如下异同:第一,两类企业的区位选择路径存在系统性差异。数字平台企业主要遵循“资源主导型”与“制度适配型”路径,而非数字平台企业则更倾向于“行业—制度协同型”与“行业—资源协同型”路径。第二,在数字基础设施偏好上存在显著区别。资源禀赋充裕的数字平台企业倾向于进入数字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东道国,借助其先进的数字服务能力,在竞争格局未定的市场中迅速构建先发优势与市场势力,而非数字平台企业则更偏好选择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目的国(地区),以保障跨国运营效率与稳定性。第三,在战略路径上存在共性可能。基于战略三角观的理论框架,两类企业均可通过“均衡发展型”路径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体现出产业、资源与制度因素在特定条件下的协同配置价值。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将样本频数阈值从1提升至2,以筛选更具代表性的组态,从而评估不同一致性水平下结果的敏感性。(2)调整部分条件的校准区间,将校准锚点设为75%、50%与25%,观察组态的变化情况。测试结果显示,尽管存在轻微波动,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五条主要路径整体保持稳定,未因阈值微调而发生显著改变^①。这表明组态间结构关系具有较强稳健性,研究结论具备一定的普遍性与可靠性,能够抵御因校准标准细微变化所带来的潜在偏差。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持续发展,正在推动数字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并深刻重塑国际业务活动方式,引发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系统探究了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组态路径及其异质特征,揭示了两类企业在OFDI决策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与差异化条件。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平台企业主要遵循“资源主导型”与“制度适配型”配置路径,而非数字平台企业则倾向于采用“行业—制度协同型”与

^①由于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在线阅读”栏目查询、下载。

“行业—资源协同型”组态路径,显示出二者在区位选择逻辑上的差异性;(2)资源优势突出的数字平台企业更倾向于进入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数字流通限制较高的东道国,旨在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构建先发优势;(3)对采取“制度适配型”路径的数字平台企业而言,地理距离依旧是影响其 OFDI 选址的重要因素;(4)在产业环境、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三大因素上均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地区),能够同时对两类企业形成强有力的 OFDI 吸引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启示:

从企业层面看,首先,由于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差异,数字平台与非数字平台两类企业拥有的资源和技术禀赋各不相同。企业需要结合行业特征和自身资源、技术禀赋扬长避短,选择符合自身国际化发展规律特征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路径,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其次,具备强大的资源支撑能力的数字平台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时,可优先考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的东道国市场,为企业创造多重竞争优势。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的目标市场中,率先进入的数字平台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标准输出和用户习惯培养,获得显著的先发优势。最后,数字平台企业应当牢固树立数据责任意识,制定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体系,获取合法性以更好地进入东道国市场。

从政府层面看,首先,加强对当地数字平台用户数据安全保护和跨境流动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提高数字平台企业进入当地市场的合法性。其次,通过系统性规划和多维度投入来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水平,重点推进 5G 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为非数字平台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扩张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便利空间。最后,积极引导数字平台企业与非数字平台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两类企业共同协作拓展对外直接投资业务。数字平台企业能够为非数字平台企业提供数字化技术、全球用户网络等优势资源,而非数字平台企业可以贡献行业专业知识、本地市场经验等传统优势,促进两类企业的协同互动,共同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杜国臣,吕振艳.“战略三角范式”下的企业集团竞争优势——理论框架与研究综述[J]. 经济管理, 2013(5): 179-189.
- [2]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等. 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 2022(9): 127-145.
- [3]郭敏敏,衣长军,李楚薇. 倍道而进还是循序渐进: 数字平台企业国际化速度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25(5): 90-102+137.
- [4]何晓明,廖晓语,蒋建勇. 乘风难破浪? 中医药文化差异下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研究——基于“战略三角观”的组态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25(4): 16-26.

- [5] 蒋殿春, 彭大地.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 国际贸易问题, 2023(10): 36-52.
- [6] 蓝海林, 刘朔, 黄嫚丽, 等. 转型期中国企业核心专长构建机制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6): 28-36.
- [7] 李潇, 韩剑. 数字型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理论变革、新型特点与中国因应[J]. 经济学家, 2023(10): 65-75.
- [8] 李晓静, 蒋灵多, 罗长远. 数字技术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 学术研究, 2023(5): 108-116.
- [9] 马鸿佳, 王春蕾, 李卅立, 等. 数据驱动如何提升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竞争优势——基于数据网络效应视角[J]. 管理世界, 2024(12): 170-185.
- [10] 马述忠, 吴鹏, 房超. 东道国数据保护是否会抑制中国电商跨境并购[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2): 93-111.
- [11] 沈洁. 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与评估: 标准、结果和驱动因素[J]. 学术研究, 2022(4): 96-104.
- [12] 史瑞祯, 桑百川.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区位选择: 要素环境竞争力视角[J]. 国际经贸探索, 2022(8): 85-100.
- [13] 王晶晶, 余雅楠. 数字贸易规则与企业数字型跨国并购[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5): 39-57.
- [14] 王寅, 贾翠雪, 张明明, 等. 如何实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高水平双元创新——基于战略三角的组态分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4(2): 87-102.
- [15] 文余源, 杨钰倩. 投资动机、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学家, 2021(1): 81-90.
- [16] 吴小节, 马美婷, 汪秀琼. 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J]. 管理工程学报, 2023(1): 31-46.
- [17] 徐美娜, 夏温平. 数字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入与扩张决定: 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的分析视角[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12): 68-85+133.
- [18] 杨栋旭, 张先锋. 管理者异质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10): 162-174.
- [19] 杨连星, 王秋硕, 韩彩霞. 数字贸易与跨国并购影响研究: 理论机理与中国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3): 112-130.
- [20] 衣长军, 颜诗琪. 华人移民网络对我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影响研究[J].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25(1): 115-128.
- [21] 余珮, 陈漪澜.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动因探究——基于 QCA 方法的组态分析[J]. 经济管理, 2024(1): 111-131.
- [22] 袁柳, 李勤昌. 新发展格局视域下制度距离、政府态度与中国 OFDI 区位选择[J]. 宏观经济研究, 2022(7): 5-21+87.
- [23] 张纪凤.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战略三角”的分析框架[J]. 财经论丛, 2015(3): 3-9.
- [24] 张新民, 韩紫轩, 杨道广. 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企业数字并购决策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3): 1-16.

- [25] 赵家章, 周凡煜, 连慧君. 移民网络、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 OFDI 效率[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6-29.
- [26] 赵云辉, 陶克涛, 李亚慧, 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 QCA 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1): 118-136.
- [27] AUTIO E, MUDAMBI R, YOO Y. Digit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a Turbulent World: 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21, 11(1): 3-16.
- [28]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29] BROUTHERS K D, GEISSER K D, ROTHLAUF F.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busines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6, 47(5): 513-534.
- [30] CADER H A, CRESPI J M, LEATHERMAN J C. What Factors Affe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rm Location Choices in Middle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Variation in Kansa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13, 36(2): 207-234.
- [31] CENNAME C, SANTALO J. Platform Competition: Strategic Trade-offs in Platform Marke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11): 1331-1350.
- [32] CHEN L, SHAHEER N, YI J,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Penetration of ibusiness Firms: Network Effects, Liabilities of Outsidership and Country Clou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2): 172-192.
- [33] FAINSHMIDT S, WITT M A, AGUILERA R V, et al. The Contributions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 51(4): 455-466.
- [34] JAIN N K, KOTHARI T, KUMAR V. Location Choice Research: Proposing New Agenda[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6, 56(3): 303-324.
- [35]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 [36] PENG M W.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2): 251-267.
- [37] PENG M W, SUN S L, PINKHAM B, et al.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23(3): 63-81.
- [38] PENG M W, WANG D Y L, JIANG Y.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5): 920-936.
- [39] PORTER M E. The Contribution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o Strategic Management[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1, 6(4): 609-620.
- [40] SURANA A, CHAVAN M, KUMAR V, et al.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Indian ibusiness Firm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4, 33(4): 102255.
- [41] WANG J, WEI Y D, LIN B. Functional Division and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Outward FDI: The Case of ICT Firm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20, 53(5): 937-957.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vs. Non-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 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GUO Minmin, YI Changjun, LI Chuwe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Abstract: By disrup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value creation models,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the logic behind their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is paper took the OFDI of the 2023 Forbes Global Top 100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applied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the configuration paths and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location choice in OFDI between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non-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exhibit two types of location choice paths: “resource-dominated” and “institution-adaptive,” while non-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demonstrate two configuration path types: “industry-institution synergy” and “industry-resource synergy.” This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paths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from a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ies in the emerging organizational form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their investment layouts globally.

Keywords: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Location Choice; Strategic Triangl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责任编辑 祝子白 白光)